

# 佛教入華後對中國文學之影響

黃麗華

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會第四屆佛學論文

## 一、佛教之傳入

佛教起於印度，教主乃釋迦牟尼佛，本為印度加比羅國淨飯王之太子，生於周靈王十五年甲辰，至周敬王四十二年癸亥圓寂，其教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大地山河，皆緣心起。故以心無所住，破一切相；以眾生平等，破種姓見；以因果輪迴不滅，奉勸世人，脫塵見性，即成無上正覺。自佛年三十成道，說法四十五年後，覺行圓滿而入涅槃。弟子輯所說法，為經五千七百餘卷，廣為流傳。至東漢明帝時，迦膩色迦王，君臨大月氏，其教遂由西域傳入我國。

自東漢至中唐，有西域諸國及印度高僧東來震旦弘法者，約達七十餘人，歷盡千辛，取道葱嶺，經流沙河，始入關中洛陽，其中以安清、佛圖澄、僧伽提婆、鳩摩羅什等人，又有達摩自海上東來弘法；率出於王公，貴族之家，安清與達摩更身為王子，不嗣高位，毅然決然離鄉背井，僅為傳法救迷情。中僧西行求經者，首為朱士行，其後絡繹不絕，而以法顯、玄奘、義淨為最著。自此乃成中外文化與學術思想的交流。

## 二、魏晉時代儒學的衰微與佛教的傳佈

孔子之生並釋迦牟尼時，固有先後而已。儒學在漢代雖盛極一時，到了魏晉，便呈現出極度衰微無力的狀態。其原因有二：一面是因其本身的墮落，無法復取得青年的信仰，故將其地位降低，而讓之於新來的思潮。自漢武帝從董仲舒之議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學之後，儒學不但蔚然成風，而且發展成獨樹一幟！文學思潮物極必反，盛極則衰，乃勢之所趨，逐漸地——儒學加入了陰陽五行的學說，以及讖諱符命的怪論，於是當代儒家，帶了濃

厚的方士氣味，儒教竟成了迷信化與鬼神化之宗教。另一方面誠如傅玄在舉清遠疏中所說：「魏武好法術，而天下貴刑名；魏文慕通達，而天下賤守節。其後綱維不攝，而虛無放誕之論，盤於朝野，使天下無復清議，而亡秦之病，復發於外矣。」於是儒學自然地趨於衰微，而由佛學取而代之了。

魏晉時代政治動搖，民不聊生，因此成了最適合於宗教發展的時代——當佛學初來中國，多係口傳，國人尙難解其真義，自漢皇帝信佛，臣僚士子乃爭相效尤。西域傳說：「桓帝並祀佛老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後遂轉盛。」於是譯經事業興起，至漢末有牟子討論佛義的理惑論，佛教本身便漸漸顯明。到了魏晉，佛教成了民間信仰的宗教，與當代學術思想界的正統。是以遁世超俗之風日盛，出家為僧者也就日多了，當時最有名的高僧，不僅宣揚佛理，並且精通中國哲學，為時流所敬重。西晉時，文人與沙門深交者數見不鮮，至東晉，此風日熾，士人研究佛理，簡文帝門下僧人出入若集。士人求逸樂反傳統排聖哲非禮法的浪漫思想，促成舍儒而合於佛之文風，彼取佛家之厭世，加以闡揚，逍遙自尊的結果，造成了中國有史以來空前未有的浪漫生活。

## 三、佛經轉讀與聲律的成立

中國文字的特質，是孤立與單音。因其孤立，宜於講對偶，因為單音，宜於講音律。字句的對偶，在王褒、張衡、王粲諸人的詩賦裏試用日繁；於是六朝駢儷極盛之風。至於音律，古人亦頗注意，然所言皆為自然音調的和諧罷了，還沒有達到人為的聲律限制。所謂的周秦古音，僅有長言的平聲與短言的入聲，直到魏晉，聲韻之學漸漸興起。曹魏李登曾作聲類十卷，由此可知，魏晉時代，聲韻的研究已有清濁宮羽的分別了。然沒有四聲之名

。宋齊以來，佛經轉讀之風日盛。讀經非僅誦其句而已，必須傳其美麗的有輕重節奏的聲音。慧皎高僧傳曰：「自大教東流，乃譯文者衆，而傳聲者蓋寡。良由梵音重複，漢語單奇。若用梵音以詠漢語，則聲繁而偈迫，若用漢曲以詠梵文，則韻短而辭長。」此謂單音的漢語，不易傳達梵音的美妙。慧皎又以為若能精達經旨，洞曉音律，誦經的聲調之美，則確有繞樑不絕之狀。又曰：「天竺方俗，凡是歌詠法言，皆稱爲唄。至於此土，詠經則稱爲轉讀。歌讚則號爲梵音。」中國語音既不宜佛經的轉讀與歌讚，欲達到此目的則須參照梵語的拼音，而求漢語順應之轉變，於是乎二字反切之學便興起了。反切既盛行，聲音之分辨則日益趨於精密與確切了，因此四聲得於齊梁時代成立，實受佛經轉讀的影響。

#### 四、佛教傳入促成中國唯美文學的發達

佛經轉讀造成四聲的成立後，以此發明應用到文學上去，創爲四聲八病之說，於是詩文的韻律漸漸形成，平仄的講求日益嚴密，而當日作品，更成爲嶄新的作品了。沈約等文悉用宮商，將手上入四聲以此制韻。有平頭，上尾、蜂腰、鶴膝，五字之中音韻悉異，兩句之內，角徵，不可增減，此即爲「永明體」。由此可知聲律論之興起，對於中國文學，實有重大的貢獻。於是一時士流景慕，務爲精密，鬣積細微，專相陵架。「由元嘉時代極盛的詞藻雕琢之風，再加以聲病的限制，因此文學更趨於技巧與形式的唯美。駢文變爲四六，古詩變爲新體，書札序跋評論的雜文，也都趨於聲律化、駢儷化了。當日唯美文學的發達，聲律說之興起，實爲主因，然佛教傳入後，四聲始應運而生，此功不可沒矣！

#### 五、佛教對宋元理學的影響

理學之形成，是由於儒家之自覺自發，以復興中國文化之道統爲己任，本孔孟義理之學，而融合道家之玄理，佛家之心性，相激相盪，相反相成，而剏此儒學之新境界。先秦學者多研討義

理之學，雖諸子爭鳴，各有所尚，要皆起於救世之一念。魏晉隋唐之間，學者對於煩瑣學派發生厭倦。於是清虛之玄學，寂淨之佛學，應時而起，風靡一時。而唐以前之佛教，猶守印度本來面目。唐以來之佛教，則具有我國之濃厚色彩。如華嚴宗之圭峯大師著原人論，融合儒佛之說，以明心性爲本原。天台宗之荆溪大師著有玄義，藉知行以照性，由性以起修，與中庸率性修道之旨暗相合。至禪宗之惠能，卽心是佛，以擺脫教網，不墮名相。又凡日用倫常之事，如恩養父母，尊敬長上等，均無礙於佛門之潛修，而理學明心見性之說，如朱子大學之明德，以「虛靈不昧」釋之，蓋亦有借助於他山也。

六祖惠能所作佛語，不僅深契佛性，且與孔孟傳統思想，大體相似。其言「萬法盡在自心中。」卽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之謂。又如云：「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，性在身心在，性去身心壞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」此又與孟子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向，唯心之謂與！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」諸語相類似。由孔孟以下至宋明理學，所受佛教思想的影響，其迹甚爲顯著。

#### 六、結論

論中國所受外來文化的影響，在歷史上，無過於佛教的輸入。佛教初入中國，中國人自覺他的教理洋洋乎！浩浩乎！奧乎不可測，非中國固有的思想可及，西行求法的，翻譯佛典的，先後輝映，盛極一時。中國人本最善於容納外來的文化。對於佛教，一面固震驚其偉大，一則以仿效與吸收，兼程並進，終於改變了佛教的本來面目。

自唐而宋，中國詩人，雖多方外之交，但僅如朱孟實所說：「有意參禪，無心證佛。」何曾想求得徹悟。惟佛經的翻譯，對於文藝作風和情趣，卻有極大的影響，近代的純文學、如小說、歌曲，皆與佛經的翻譯有關，佛教的傳入中國，更使中國文學發出異樣的光彩，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輝煌的一頁。